

刘延苗  
著

# 章学诚史学哲学研究

ZHANGXUECHENGSHIXUEZHEXUE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延苗  
著

# 章学诚史学哲学研究

ZHANGXUECHENGSHIXUEZHEXUE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学诚史学哲学研究 / 刘延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161 - 0949 - 6

I. ①章… II. ①刘… III. ①章学诚(1738—1801)—史学  
思想—研究 IV. ①B24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4691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关于中国史研究的三点思考(代序)

方光华

## 一 深化对中国史的时代属性的观察

历史研究是有时代属性的。历史研究与时代思维的内在结合,是历史学研究成熟的标志。关于历史认识的价值,《易传》曾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说:“彰往而知来”。即是说对“前言往行”,不能局限于铺张描述,还要有助于提高认识事物、预察未来的能力。清代王夫之将史学的认识功能阐述得更加明确。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sup>①</sup>可见中国史学有这样一个传统:把历史研究的学术活动与研究者自身和时代统一起来,对历史的观察总是反映出时代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对于三代以上的历史就有两种不同的观察。一种以儒家为代表,他们认为上古以来的历史证明礼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在论述上古历史时,儒家学者尽量剔除古圣帝王身上的神话性内容,认为尧、舜、禹等都是在人伦道德方面有继承与发展的人。而道家则提出另外一种历史观,他们认为礼制是罪恶之源,天道自然才是历史的本质。道家认为越是古远的帝王,越自然无为、适性自足,更加接近

---

<sup>①</sup>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6—157页。

历史的真理。<sup>①</sup>这两种不同的历史认识，恰恰与儒、道两家对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认识和思考是相关的。儒家认为人性中仁爱的力量、正义的力量、秩序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道家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自然界在无为中实现完美和谐的神秘力量。可见，是时代主题推进历史认识的深入展开，导致历史认识的多样性，而历史认识又深化了对时代主题的观察。

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主题联系紧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意识到传统史学不能给时代所需要的“新民”提供养料，不能给时代出路提供有益的启示，呼吁“史学革命”，提出历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发生变化。新的历史学须从过去的踪迹中观察到未来的走向；须对公民的社会生活建设有所参考；须能够激发民族精神。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史研究出现三种主要史学流派，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另一个是自由主义史学流派，再一个是守成文化史学流派，这些流派都提出了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观察，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史的内涵与深度。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侯外庐先生，他始终坚信中国社会朝民主与科学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思想史浓厚的宗教因素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批评，对中国思想史自然观不发达所导致的理性精神不足做了深刻分析，并认为中国思想的上述特点与中国长期的土地国有制所造成的私有观念不发达是相联系的。他指出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路径，当务之急是扬弃中国历史中的不合时宜的内容。另一个是钱穆先生，他认为中国历史中情感因素多，自然科学研究不足，是中国农业文明人文主义色彩很重的表现，中国历史重视群体生命的延续，不追求个体物质利益与经济权益的无限满足，而追求个人精神生活宁静与群体和谐，它恰恰反映了中国历史极其深刻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上述对中国史两种不同的观察，反映出对近代中国文化何去何从两种不同方向的认识。一种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或许会与西方走不一样的道路，但必定会依循人类普遍的共同价值；另一种认为不管历史如何变化，在中国历史之中已经包含天人合一

---

<sup>①</sup> 《庄子·胠篋篇》曾提到十二位古帝王：“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等人类普遍价值追求。

与时代的紧密联系,是历史研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孔子的《春秋》如果没有对“其义则丘窃取之”的时代判断,司马迁的《史记》如果没有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理性思考,就不可能有这样持久的魅力。同理,侯外庐、钱穆的历史研究,如果没有关于时代主题问题的认识,他们的著作就不可能有这样持久的魅力。历史学者关于时代主题的哲学体察有助于他们的具体历史研究,而他们对历史的具体研究又反过来丰富了他们的哲学体察,并展示出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当前,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加快,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中国如何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怎样才能实现不同文化的和平、发展与合作,需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及其所蕴涵的世界性价值重新分析。今天,我们更加需要站在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应当在史学与中国发展趋势乃至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反思这些重要问题上,提供更有启示的思考。

## 二 加强对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

“国学”或“古典学”是否应该成为中国历史学科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甚至是否应该独立于中国历史、文学和哲学学科之外,已经成为学术界所讨论的热点话题。

20世纪,对于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与对中国物质生产生活历史及社会组织历史的研究相比较,显得相对薄弱。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物质生产生活及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成熟与发展。作为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创造和传播者——中国历史中的知识群体,与中国物质生产生活的劳动者、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历史的积累既表现为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表现为精神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与历史中的思想创造有密切的联系。可见,今天的中国史研究,提出要强化对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当然它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自觉思潮也有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历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 但从哲学、历史乃至文学学科的整体来看, 20 世纪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首先, 大家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中国历史中的思想性元素, 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学, 诸子和宗教思想乃至关于科学与科技的思想都需要同等对待。其次, 在研究方法上, 除了对传统学术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外, 20 世纪还开拓出与考古学深度结合、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思想观念相比较、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深度结合等多种方法。其中特别是思想历史与社会历史的相互贯通, 或许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研究方法划时代的进步。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侯外庐就指出, 要准确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 必须“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 这就需要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有深入的探讨。他以《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为依据, 提出研究社会经济形态, 关键要研究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根据这一原理, 他剖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 并依此观察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 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 阐述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 并从体系化、制度化的思想形式去研究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统一的程度。思想历史与社会历史的相互贯通, 说明思想观念的研究不能局限在以思想解释思想, 只有从思想与社会历史的互动, 才能准确判断思想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因此, 如果从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传统来看, 加强对中国历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 充分吸收和消化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所取得的理论与方法成果, 将“国学”或“古典学”作为中国历史学科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 是必要的, 同时也是可行的。

### 三 重视中国史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

史学研究成果, 最终都要通过文辞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古代历史学非常重视历史认识的表现形式, 创造了编年体、记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多种历史体裁, 而且也很重视历史知识的传播。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随着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传播到中国, 人们开始意识到, 与西方学术相比较, 中国学术缺少西方学术那种明确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 于是倡

导对中国历史规则进行理论提炼,对具体历史问题做严密的研究。历史研究追求把复杂的历史事实描述清楚,把观点讲明白。历史认识成果的表述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章节体和论文成为历史著述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个变化确实大大提高了中国史学科的科学化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不足,历史作品失去了鲜活的趣味,给读者留下的是一大堆过于宏观的原理和逻辑严密的论点。

如何在保持历史著述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同时,增强历史作品的文学性,值得历学家认真思考。其实,历史是有情感的人的创造。历史事实与自然现象不同,它充满了变数,与历史资料不相冲突的历史推论往往也不止一种。对这样的研究对象的描述,如果缺少一些文采,多少有点令人遗憾。优秀的历史学家都很重视文采。章学诚就曾经指出:“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sup>①</sup>有的历史研究者认为“文取理明而事白,其他又何求焉”,章学诚提出批评:“不知文情未至,即其理其事之情亦未至也。譬之为调笑者,同述一言而闻者索然,或同述一言而闻者笑不能止,得其情也;譬之诉悲苦者,同叙一事而闻者漠然,或同叙一事而闻者涕洟不能自休,得其情也。……不知使人由情而恍然于其事其理,则辞之于事理,必如是而始可称为达尔”<sup>②</sup>。同讲一个笑话,有的让人捧腹大笑,有的让人索然无味;同诉一个悲痛,有的让人涕泪横流,有的却让人无动于衷。造成其中差异的原因是,前者局限在把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而后者善于用感情丰盈而真挚的文字打动人心,引起听者情感的波动与共鸣。当然,史学与文学毕竟不同。文学追求创造性、新颖性,它的文字表达越新颖、越独特就越好,而史学的文字忌讳自以为是,它贵在对各种文献资料、各种说法进行“陶铸”,选择最合适的文字表达。运用文学形式使历史认识成果的表现更加富有感染力,看来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历史认识成果的传播,除了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文学表达方式的特长以外,还需要关注与现代传媒特别是视觉艺术的有机结合。历史认识成果的

①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文史通义》,刘公纯标点,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45页。

② 同上书,第201页。

传播，与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是相关的。今天的文化传播，在视觉艺术方面进步显著。此外，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保持民族文化遗存的独立性、丰富性和完整性，对于中国的自身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十分重要，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对于历史认识的表述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历史认识的成果，需要以大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向社会广泛传播。

刘延苗所著《章学诚史学哲学研究》一书即将出版。该书是她在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撰写的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而成。她将章学诚的史学哲学分为三部分：史学的概念，史学认识论，对史学义例、史义、史德诸问题的哲学思考，具体讨论了章学诚对于历史学是什么、历史事实如何构成、历史认识成果如何有效表达、历史学家自身需要注意哪些修养等思想，比较符合章学诚史学思想鲜明的反思特点。她之所以没有采用学术界惯用的“历史哲学”一词，主要是因为历史哲学的双重含义，它既指历史的哲学又指历史学的哲学。如仓修良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章学诚的历史哲学》，探讨的就是章的关于历史的哲学观点，而刘延苗主要讨论章学诚关于历史学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关于历史学的哲学思考，不必用“史学哲学”这样生僻的词，完全可以改为史学思想甚至史学理论，但她认为，现在的史学理论主要是对历史研究的这样或那样的原理，而章学诚的史学思考是对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哲学反思，它提供的是“宏观的认识视野和思想眼光”，她坚持用“史学哲学”一词。据白寿彝先生说，中文的“历史”一词是20世纪早期从日本引进的，在中国的使用还没有超过一百年，中国古代只有“史”一词，章学诚是18世纪的中国学者，我个人认为，她使用“史学哲学”一词或许也未尝不可。

读了她的书稿，我对中国史研究的前景引发一些联想，权且当做该书的序言。我想读者朋友一定会从该书中引发更多的联想。

# 目 录

|                         |        |
|-------------------------|--------|
| 关于中国史研究的三点思考（代序） .....  | 方光华（1） |
| 导论 .....                | （1）    |
| 第一章 什么是史学 .....         | （17）   |
| 第一节 章学诚论“道”与“学” .....   | （17）   |
| 第二节 章学诚对“史学”概念的认识 ..... | （28）   |
| 第三节 “史”与“经”的关系 .....    | （37）   |
| 第四节 “史”与“文”的关系 .....    | （44）   |
| 第五节 现代视野中的历史学概念 .....   | （56）   |
| 第二章 历史的事实 .....         | （67）   |
| 第一节 历史的资料 .....         | （67）   |
| 第二节 历史的证据与事实 .....      | （78）   |
| 第三节 历史事实的内容 .....       | （92）   |
| 第三章 历史理解、解释与评价问题 .....  | （103）  |
| 第一节 历史的理解 .....         | （104）  |
| 第二节 历史的解释 .....         | （118）  |
| 第三节 历史的评价 .....         | （128）  |

|      |                             |       |
|------|-----------------------------|-------|
| 第四章  | “圆通”、“史义”及“史德”问题 .....      | (141) |
| 第一节  | “圆通”——章学诚对史学义例问题的哲学思考 ..... | (141) |
| 第二节  | “史义” .....                  | (150) |
| 第三节  | “史德” .....                  | (163) |
| 第五章  | 章学诚史学哲学的学术背景及其成就与缺陷 .....   | (177) |
| 第一节  | 章学诚史学哲学的学术背景 .....          | (177) |
| 第二节  | 章学诚史学哲学的成就与缺陷 .....         | (196) |
| 结论   | .....                       | (213) |
| 参考文献 | .....                       | (219) |
| 后记   | .....                       | (226) |

## 导 论

章学诚生于乾隆三年（1738），死于嘉庆六年（1801），离世已经有二百多年了。历史的天空斗转星移，二百多年的沧桑却没有让章学诚湮没在岁月之中，或许，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什么。

学术界公认最早研究章学诚的是日本的内藤虎次郎<sup>①</sup>，他撰写了《章实斋先生年谱》，1920年发表于日本的《支那学》杂志，《年谱》的序说对章学诚的学术做了如下评价：章的名著《文史通义》“试图以其新建立的一种史论，对经、史、子、集各部进行总结性的批判”<sup>②</sup>。章的学术渊源在于刘向、刘歆父子，也有得自刘勰、刘知几及郑樵等人的地方，但大部分都是独辟蹊径。章学之大体构成近于宋学，与当时流行的汉学研究方法全不相干，与缘汉学家之刺激而新兴的整齐类比及考逸搜遗之史学也不相同，但又不像宋学那样高谈性命。其作品《原道》，乃是有关社会形成的一种考察。其关于经典源流的考察，是一种历史研究法。章的著述能够摆脱经学家的拘执，提倡体制的自由，承认独立构想的价值，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在中国经学和史学的研究中，可谓一枝独秀。

1922年，胡适有感于章学诚这样一位中国学者，竟由日本人最先发

---

① 内藤虎次郎，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译为内藤虎之郎，王标在山口久和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中将之译为内藤湖南。

② 转引自〔日〕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该书还介绍了日本学者井上进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推翻了由内藤博士最先发现章学诚学术的定论：“井上进《‘六经皆史’说的系谱》，是一篇以文献搜博作支撑、许多敏锐的洞察溢于纸面的优秀论文。该论文主要结合章学诚之后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朝有名无名学者的发言，细致地记述了《文史通义》的评价和受容的痕迹。其结果表明内藤湖南首次发现章学诚‘绝学’的一般说法应该得到修正，在中国，章学诚的学术就像绵延不绝的水脉一样流淌于晚清思想史的底流。”以上内容见该书第13页。

现并撰写了年谱，遂决定写一部更为翔实的章实斋年谱，后又有姚名达对之进行增补，增补后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于1931年出版。该年谱较之内藤先生的分量要大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在每一个年份下，不但有章学诚的行止和著作，而且还将著作中的重要文字摘录出来加以分析和评说，是很扎实的学术著作。

为胡适和姚名达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作过序的何炳松也是研究章学诚的较早的学者之一。何的《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正如文中所言，是对《文史通义》“摘其精华，类别之以自备参考”；《章学诚史学管窥》是在《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的基础上，补充了《章氏遗书》中的资料而形成的。这两篇著作虽然是札记性质的，但它们对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梳理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在《增补章实斋年谱序》里，何炳松把以前赏识《文史通义》的人分作两类：一类赏识《文史通义》中的“事”，另一类赏识《文史通义》中的“文”；而胡适、姚名达和何自己则属于赏识《文史通义》之“义”的人，“义”就是章对于史学的卓见。何以为这种卓见最重要的有三个：记注和撰述的分家；对通史的观念表示得非常切实非常正确；章的“天人之际”就是现在所说的历史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后有钱穆的学案体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成于1937年，其中一章是专门介绍章学诚的。钱穆认为：“近代治实斋之学者，亦率以文史家目之。然实斋著《通义》，实为箴贬当时经学而发，此意则知者甚鲜。”<sup>①</sup> 经学家的最大理论为“道在六经”，“通经所以明道”，自顾炎武唱“经学即理学”，迄戴震无变。钱对比戴震和章学诚说，戴震“有所谓一常，有所谓同德，即圣人六经而求之者是也。实斋则称事变，称时会，称创制，不能即圣人之六经而求。盖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实两氏议论之分歧点也”<sup>②</sup>。钱穆认为实斋唱“六经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sup>③</sup>，“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舍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训诂考订，而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20页。

② 同上书，第424页。

③ 同上书，第430页。

述，断可知矣”<sup>①</sup>。在为学方面，章学诚反对把考据看做唯一的学问与方法，“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也”<sup>②</sup>。“学者从人，必发端乎一己之性情，而成为经世之事业，乃得为学业之真。人之性情既万殊而不同，世变亦千古常新，则为学更无一定之规矩，亦无共遵之途辙矣。”<sup>③</sup>

山口久和说：“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是对当时经学理论的反抗，站在这种观点上，最早尝试将他的思想放在清朝广泛的知识状况中进行考察的是钱穆。此后，在清朝的学术状况中彰显章学诚思想的视点成为通常的研究手法。”<sup>④</sup>

侯外庐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其中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部分经过补充修订以后，单独成书，改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即1956年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其中也有一章专门介绍章学诚。侯认为章“在那样的时代，发出了一种对汉学的抗议，部分地继承了十七世纪大儒的传统。所谓‘部分地’，是说他的成就是在文化史学方面，他还不能全面地深刻地光大清初大儒的近代意识”<sup>⑤</sup>。侯外庐说，虽然有人指出过《文史通义》近于历史学，但他认为《文史通义》更近于文化史，而章的“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也即是章自己所说的“议文史亦未能自拒于道外”。“史意”的含义是什么呢？“一个时代各有一个时代的风气，此不过历史发展的‘一节’，而求所以然之理，则在于把握历史的‘全量’或全链，而通其一般的义旨。这就是他所谓的史意。”<sup>⑥</sup>侯外庐认为，章学诚持一种文化变革论：“学诚不讲道统心传，而由学术文化史家的眼光，把历代思想学业的变迁，认为‘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更以为是一种不得不然之势，是经世之学在时代发展中的一节，而时代一有变化，便使学业也必然‘极而反之’。”<sup>⑦</sup>侯外庐还指出了章学诚学术的个性化特征：“由理学的烦琐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32页。

② 同上书，第444页。

③ 同上书，第447—448页。

④ [日]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第9页。

⑤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页。

⑥ 同上书，第494页。

⑦ 同上书，第496页。

到考证的烦琐，其烦琐的对象不同，而拘束个性的独立发展，则殊无二致。学诚就在这个时候出来挽持风气，主张‘以意为宗’，‘全其所自得’。”<sup>①</sup> 侯外庐还把章学诚的思想和费密加以比较：“他也如费密论学术流变，還元于人类质性的变化。他重视个性的发展之有助于学术的成就，是有其时代意义的。”<sup>②</sup>

张舜徽的《史学三书平议》中有《文史通义平议》，作于1952年。此著作主要是针对《文史通义》中的一些具体文字和段落加以解释、评议和发挥，很有见地。在著作的最后，张对章学诚学术的缺点与贡献作出了很客观的评价。

中国台湾旅美学学者余英时对章学诚有精深的研究，代表作有专著《论戴震与章学诚》、论文《章实斋与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章学诚文史校讎考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等等。余英时研究的特点是把章学诚放在整个清学史以至整个儒学史的背景中来定位。宋明儒学的特点是“尊德性”，清代儒学之运则为“道问学”，戴震与章学诚同为完成儒学由“尊德性”到“道问学”之转变的中心人物。《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的主要特点是从章学诚立说时的心理背景出发去分析章的理论，尤其是戴震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比如说章学诚的义理发展始终与文献整理的工作相结合，是因为章深知清代学术上的虚实之辨，担心别人批评他徒具空言而不能征诸实事；“六经皆史”说则是针对戴震“道在六经”的基本假定和顾炎武以来“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的系统的反挑战；浙东学派只不过是一种大体上共同的治学精神，章学诚对浙东学派的夸张，其心理背景有两方面：一是学术上的寂寞以至孤愤，二是为了说明戴震和他的关系确与朱、陆的关系相对应，希望在学术上能够与戴震相抗衡。在《章实斋与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一文中，余英时从人文精神、言事合一、笔削之义和一家之言几个方面分析了章学诚与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相似之处，颇具启发性。

1984年，仓修良的《章学诚和〈文史通义〉》出版，这是内地研究章学诚的第一部专著。书中介绍了章学诚的生活时代及其生平，《文史通

<sup>①</sup>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49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17页。

义》的编著经过、著作目的、内容和版本，并且从唯物论、历史观、治学经验、“经世致用”、作史“贵知其意”、“六经皆史”、“史德”、文人不能修史、历史编纂学及方志学等多个方面阐述了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最后还对浙东史学做了详细介绍。1996年，在《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的基础上，仓修良与叶建华合作出版了《章学诚评传》，不但补充了校讎学、谱牒学、文学以及教育思想几方面的内容，而且全书的分量大大增加，内容更加丰富，这是目前对章学诚研究最全面的一部专著。

2002年吴怀祺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出版，清代卷的著者为王记录，其中有“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一章，从“史义”、“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史德”和“文德”、“六经皆史”四个方面介绍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文中指出：章学诚通过对传统史学演变的总结，指出后代修史者及史评家只重视体例而忽视史义，严重抑制了史学的别识心裁和创造精神；章区别了“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认为史学发展的根本在于史识，在于独断之学；章的《史德》篇与《文德》篇是不能分开而论的，二者相互印证，所论全是文史创作中极具普遍性的问题，而且《文德》篇有“古文辞出于史”的理论前提，其中所论，全然是史学批评的原则，不能因其有“文”、“史”之名就贸然将其割裂；章的“六经皆史”论有两个中心目的，一是阐发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二是为变革史学提出依据。

2007年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出版，明清卷中有“章学诚对考据学的反思”一章，书中将章学诚的学术分为三部分内容——对考据学的批评、史学义例和文史校讎。章最主要的学术关怀之一是作为知识分子，如何做人和如何做学问？该问题的答案是：做人（与为学相关的做人）要先明白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做学问要明白人各有长有短，更要明白自己的长中之短。章学诚以史学义例和文史校讎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其方法侧重于综合而不是分析；章将经史子集还原为史学，并对经史关系给出了新的解释——“六经皆史”；以上两个方面贯穿到一起就是培训吏才的教化大纲。章学诚有一朴素的学术观：评价学术的标准在于它能否为现实治国服务。此部分内容的意思似乎是说章学诚的学术目的在于培养政治人才。文中还精辟地指出：“章学诚史学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将史学从缺乏个性的史局撰著中拯救出来，同时也将个人从无所不包的普

遍学术格局中拯救出来，从而促进了史学撰著从集体本位朝向个人本位的转化。”<sup>①</sup>文中还说：“章学诚向人们展示了某种人文主义的理论，它以文史为基础和渊源，逐层向后代展示人类文明（特别是思想学说）的起源与变迁过程。”<sup>②</sup>最后，著者围绕两个问题指出了章学诚学术的内在矛盾，其一是章的《春秋教》为什么没有写成；其二是章学诚易学中的象、辞二元对立问题。

除过内藤虎次郎之外，国外研究章学诚的主要著作有：法国戴密微的《章学诚和他的史学》；美国倪德卫的《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日本山口久和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

法国戴密微（P. Demieville）的论文《章学诚和他的史学》发表于1961年。在论文中，戴密微称赞章学诚是足以与欧洲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相媲美的史学天才。他认为，在中国史学史上，章学诚的主要成就是对他那个时代十分兴盛的同时也是过分的批评主义进行了批判性质的反动，但他的工作的永恒而普遍的价值则在于对史学理论的深刻反思、他所提出的方法以及这种反思的观念形态的背景。他指出，章提出的“六经皆史”的观点在他自己的时代是普通的，但在一个深层意识上，“六经皆史”联系着章的全部历史哲学，“它的双重意义应该被充分理解。章学诚宣称经典是历史，把这个命题反过来，历史也将构成经典……经典是历史，因为历史是经典”<sup>③</sup>。“道”内在于事实中，内在于历史的具体实际中，它不应该在世界之外去寻找。历史学家应该抑制无根据的理论，要紧靠事实，因此章尊重文献，因为文献是事实的表述。然而，对于文献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排除他的个性于工作之中。历史学一方面需要收集、整理和批判文献，另一方面还需要选择、解释和评价，这些意味和暗示着独断。假如没有气质和热情，就不会有真正的历史学家，虽然“气”与“情”必须受“理”的控制。“公”是本质的，但它不应该是历史学家个性的单纯消除。总之，“章在两条阵线上为史学而战斗：一方面反对宋明

① 张岂之主编，方光华、肖永明、范立舟分卷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1页。

② 同上书，第641页。

③ P. Demieville, Chang Hsueh - cheng and his Historiography, In *Historian of China and Japan*, Edited by 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78.